



查干淖尔记忆

妹妹总是争相恐后地冲出房子、爬上鸡窝去捡鸡蛋，每次都会被鸡虱子咬得哇哇叫，仍然乐此不疲。这故事我不喜欢，总觉得很恶心，好在也是听父母讲的，我不记得了……

上学要走过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地，大概走半个小时左右。那时候草原上还是有狼的，大人们说，狼会在小孩走路的时候，从后面偷袭，先用两个前爪搭在小孩肩头，如果你回头，它就会咬断你的喉咙。上学路上我总担心会有狼爪子从背后搭上我的肩膀，总想回头看看有没有狼，又担心已经有狼跟在后面，趁我回头的时候咬断我的喉咙，终究不敢回头，只好匆忙赶路。在查干淖尔小学的上下学路就这样在纠结中走过。这个感觉我记得比较清楚。

自由的土地，养育了向往自由的子民，“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的“三生三世千里草原”，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是故乡给我力量。文/锡林花

我从出生到小学二年级，一直生活在查干淖尔，期间5到7岁在北京和青海。上学前我没上过幼儿园，所以我基本可以说是在查干淖尔野地里跑大的丫头。

查干淖尔苏木(乡)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境内。查干淖尔蒙古语意为“白色的湖”，是内蒙古自治区四大淡水湖之一。

查干淖尔湖的来历众说纷纭，传说很久以前，阿巴嘎旗南部的荒漠草原上卧着一峰野骆驼，鼻铜是银子的，泉水不断从鼻铜中汩汩涌出，偌大一个泊子就环绕在野骆驼周围，野骆驼起身走动，淖尔也随着移动。后来，野骆驼来到现在的查干淖尔一卧不起，被从鼻铜里喷涌出来的泉水淹没，形成了现在的查干淖尔。

2015年我回到草原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约上一个院子长大的发小一同去查干淖尔看老宅，记忆中大大的院子和大大的房子，现在看起来那么矮小。或许是高

楼大厦看得多了，或许是我长大了，总之记忆中的老宅已经不是当年宽阔、宏伟的样子了。

记忆中大大的老井，现在已经被保护起来，木制的轱辘早已不复存在，代替的是钢铁焊接成的盒子和盖子，我蹲在它旁边照了一张像，感恩这口井水养育我长大的。据说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妈还在这井边捧了

一个大跟头，把大人们吓得够呛，不过我不记得了……

虽然我在查干淖尔生活了近6年，但是因为当时年纪小，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印象不多。我3岁时候的一个傍晚，妈妈满公社找不到我和我的发小，眼看天就要黑了，急得挨家挨户的问。有人说看见我俩出了公社向东走了，两个妈妈赶忙向东寻去。公社东面翻过一个

小山包有一个小湖，两个妈妈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俩正高兴地在湖边学野鸭子走路。后果可想而知，两个小家伙被拎回了家，每人都挨了一顿胖揍。这故事我很喜欢，可惜是听父母讲的，我不记得了……

我家在查干淖尔的时候跟邻居共享一个很大的院子，那时候家家院子里都搭鸡窝，养鸡。鸡窝下面是

搭有悬空木棍的“卧室”，鸡大叔、鸡大婶们平时在院子里到处溜达，晚上都回卧室站在木棍上睡觉。鸡窝上面是一排留有很小出入口的“产房”，里面放有已经掏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鸡蛋壳是勾引母鸡去“产房”下蛋用的。每当母鸡趾高气扬地从“产房”跳出，“咯咯哒……咯咯哒……”地宣告自己产下蛋宝宝的时候，我和

怀念老那

人老了就喜欢回忆过去，更怀念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那些老朋友。前几日，我想起了已经离开我30多年的老朋友——老那。今年正好是我们俩相识的第50个年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一起工作的那些日子，那些事在我脑海中历历在目，每当想起都会引起我深深的怀念。

老那全名那顺巴雅尔，1938年生，原籍是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他高高的个子，膀大腰圆，浓眉大眼，是个典型的蒙古汉子，而从穿戴到言语举止表现的优雅庄重，颇有知识分子风度。

我们相识在1968年，当时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的各大队接收了部分插队锻炼的大学生。插队锻炼的大学生，是拿国家工资，参加劳动锻炼两年后分配工作。老那就是其中之一，他1968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专业，插队在达布西勒图大队。

虽然仅仅是劳动锻炼，但老那是个干工作的人，下来不久就为所在大队的工作东奔西走。当时我从内蒙古蒙古文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工作，我去了以后不久就认识了他。

他到大队的第二年就帮着大队修建了大队办公室，房前还种了几棵树。当时，草原上有意识种树很难得。后来人们把这几棵树称

为那顺巴雅尔的树。现在那片办公室已经被拆了，那几棵树也不知所踪。但我每次路过这里都忍不住想去看原大队部的旧址。是去找记忆中的那几棵树呢？还是怀念植树人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到1970年6月，这些插队锻炼的大学生陆续开始分配工作，老那最初是被分配到锡林郭勒日报社。也许是留恋这里的父老乡亲，他个人申请留在基层，留在查干淖尔公社革委会当秘书，后兼任公社后勤管理员。当时我是公社党委秘书，人们戏称我们俩是公社“两大秘书”。我们各自成家后，公社盖了一院三户的平房，我俩分别住在东头和西头，不管中间那户住的是谁，从此以后此院一直被称之为查干淖尔公社的“秘书大院”。

就这样，在忙忙碌碌中一晃十年过去了，我们两家都各自添了两个千金，依然住在秘书大院，成为老邻居，孩子们也一块儿玩耍长大，成为好朋友，直到现在。

1978年我俩同时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老那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我任公社党委副书记。老那依旧为公社的发展日夜操劳，为办好苗圃，他引进果树、种植蔬菜，还要发展乡镇企业，筹建得。后来人们把这几棵树称

到1979年冬，正在他日理万机地工作时身体感到不适，白天忙起来浑身没劲，到了晚上失眠睡不好。看着他日渐憔悴的脸色，领导和同志们都劝他出去检查治疗，但他以工作忙走不开为由，就在当地医院开些药吃了继续坚持工作。一直拖到第二年的春天老那去呼和浩特市参加全区先代会之际才到医院检查的。

也许是太过辛劳，也许是天妒英才，老那不幸查出患食道癌。当时我们都很年轻，甚至不知癌为何物，偏偏是这么一个有才华、有魄力的年轻人患上如此凶险的疾病，大家都很震惊。当时组织上对他的治疗很重视，认为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立志在基层工作多年，并作出巨大贡献，难能可贵，特别批准直接转到上海做了手术。

1980年公社改苏木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老那被选为副苏木长。当时他术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执意回到苏木继续抓工作。他的精神感动了很多，至今都有人说起他当年忘我工作的事情。

1982年老那病情恶化，在呼和浩特市治疗了一段时间，他预感到自己身体快不行了，就找到内蒙古某医院，提出去世后把遗体捐赠给医疗事业做实验用，并签定了

初步协议。但后来他转到上海医院，最终在上海去世没能回来，他的这个愿望也未能实现。

到了上海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写到他病情恶化的具体情况，并同时跟我交待等他去世后如何处理后事。这些嘱托我一照办，且至今记忆犹新。他希望让我亲自主持他的追悼会，包括写悼词，同时说明需要通知的人的名单在他笔记本上已列好，家里人会提供给我，希望我协助通知。我及时回了信，尽量安慰他，鼓励他配合医院治疗。

此后不久我就接到了老那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写到：“我已经不行了，赶快派人来处理我后事。来时把我儿子带来”。后听陪床去的同志说，电报是老那去世前几分钟写好留下的。这也是我俩的最后一次通信。

接到信后，我马上派人带老那的儿子去上海处理他后事。他们从上海回来后，我召开了那顺巴雅尔同志的追悼会。老那的骨灰安葬在查干淖尔苏木昌图敖包东边的一个山坡下。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很有理想追求的基层干部，一个那么有才华的干事业者，就这样沉睡在他奋斗一生的热土里。文/苏德思勤

小当家

我的家乡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很美，有山、有水、也有草原。我在那里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

大概是在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時候吧！爸爸妈妈都出远门了，哥哥去乌兰浩特市上初中了，家里就剩下我自己。按现在的说法我应该被叫作“留守儿童”，对！当时我就是短时间的留守儿童。而且只是白天，晚上的时候我姥姥会过来陪我。那时候放学回家后很有意思……当我打开铁大门栓子，“叮”的一声后，家里养的20多只鸡会从四面八方闻讯而来，有的是从前院子踏着小碎步急匆匆地跑来，有的从两米多高的鸡舍扑闪着翅膀飞下来，而大黑猪从土别墅里冲出来，在鸡群中杀出一条自己的路，还不停地哼哼唧唧，大概是说：你怎么才回来！我都饿坏了！

在我拿着钥匙开门时，或是挽起袖子在后院砍柴时，它们都会簇拥着我。我进屋了鸡宝宝们就跳上屋外的窗台，个个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大黑猪会用鼻子拱着门板，鼻子一直哼哼唧唧……

我麻利地生起两个炉子，在大铁锅里热大黑猪的晚餐，又在另一个炉子上烧上水，然后我就能短暂的休息一下。一般会我坐在炕上，在屋里的窗台上撒一些玉米逗屋外的鸡们，它们哪知道还有玻璃这事儿呀！咚咚咚咚响地啄起来，看的我自己空无一人的大屋子里咯咯大笑！把自己逗开心了，再在屋外撒上一把一把的玉米喂鸡。别看它们这会儿傻乎乎的，它们也会精明地吓你一跳。有一次我就看见它们在后院歪掉的向日葵杆上并排站着，齐心协力一下一下地往下压着，把熟透的向日葵折掉然后啄向日葵的籽儿吃。不一会儿，大黑猪也开始美美地进餐了，这时候我会拿着树杈顺着猪毛给大黑猪细细地挠痒痒，吃饱的大黑猪那个美呀！哼哼唧唧就躺下了，挠着挠着就睡着了，真不愧是猪。忙完这些我姥姥差不多就会来，再给我这个小猪炒菜做饭……

文/永青